



东海海错

李振南

冬日清江牡蛎肥

牡蛎，也叫蛎蛤、牡蛤、蛎黄、蛎勾、蚝、蠔，属贝壳类海鲜，我国有10多种，在温带至热带海域都有分布，整体呈长片状，有两壳，表面粗糙坚硬，内面为瓷白色，晶莹光滑，是烧石灰的主要原料，也可入药。其肉为浅绿色的，卵形，撬出时香气扑鼻，吃起来咸味适宜、鲜爽可口，被人们称为“海中牛奶”。

翻阅古籍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中华古籍中如有提到牡蛎的，大多将其与温州联系在一起。如《名医别录》中说牡蛎“出东海永嘉”，这永嘉就是温州的古称。被人们称为“山中宰相”的南朝梁陶弘景也在《本草经集注》中写牡蛎“今出东海，永嘉、晋安皆好”。后来，由明代宋应星撰写的我国古代著名的科技百科全书《天工开物》第十一卷《燔石·石灰》中也云：“凡温、台、闽、广海滨、石不堪灰者，则天生蛎蚝以代之。”清代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：“蛎黄生石子上。壳与石子胶粘不分。剥肉作羹，与蚌、蛤相似，一名鬼眼，乐清、奉化两县上产，别地所无。”

牡蛎的养殖历史悠久，南朝宋永初年间，郑辑之在温州现存最早的方志《永嘉郡记》中记：“乐成县新溪口有蛎屿，方圆数十亩，四面皆蛎，其味偏好。”经文史专家考证，新溪是清江的旧称，蛎屿即今天的方江屿。据记载，公元423年，时任永嘉太守的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，曾乘船在海上巡视乐清湾一系列岛屿（包括玉环山、大小乌岛、大小担岛、大小横床岛、茅埏、茅坦岛）后，向清江进发，途经方江屿时就品尝过牡蛎并大加赞赏。他在《游名山志》残文中写道：“新溪蛎味偏甘，有过紫溪者。芙蓉山有异鸟，爱形顾影，不自藏，故为罗者所得……神子溪南山，与七里山分流，去斤竹涧数里。”这里的紫溪在浙东

诗话亭

陈大新

古风杂记

刘广荣

古代精彩纷呈的冰雪运动

冰雪运动，除了暖身，还可以健身，因此古人对其颇为热衷。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云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诗中“如履薄冰”的意思是好像踩在薄薄的冰上。在古人看来，冰上行走也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运动——小心翼翼地脆弱的冰面行走，不仅需要凝神静气，更考验身体的协调与平衡，稍有不慎便有随时掉入水中的危险。这种与冰雪的互动虽带着风险，却也是古人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。

“骑木而行”“乘冰逐鹿”“乘木马”是古人原始的冰雪运动。唐代魏徵在《隋书·列传》中提到：“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，分为九部落……气候最寒，雪深没马……地多积雪，惧陷坑阱，骑木而行。”当时天气十分寒冷，雪特别厚，马容易被雪埋没不能动弹；人害怕陷于积雪之中，所以骑木滑行。唐代史学家杜佑在《通典》中说：“人皆著木脚，冰上逐鹿，以耕种射猎为业。”北方部落的人喜欢打猎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耕种收获少的时候，他们就穿木质鞋，在冰上追赶野鹿。

“木突厥三部落曰都播、弥列、哥俄支，其酋长皆为颏斤。桦皮覆室，多善马。俗乘木马驰冰上，以板藉足，屈木支腋，蹴辄百步，势迅激。”宋代欧阳修、宋祁等编撰的《新唐书·回鹘列传》中说到，木突厥三部落的人善于骑马，有在冰面上乘木马的习俗。此木马由踏板和弯曲的木条做成，踏板支起弯曲的木条。人乘木马时，把脚系在踏板上，把弯曲的木条支在腋下，用力一滑，动辄溜出百步，速度快且有力。这“木马”与今天的滑雪板十分相似。

“凌床”“拖床”冰雪运动很是有趣，北宋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说：“信安、沧、景之间……冬月作小坐床，冰上拽之，谓之‘凌床’。”那是在冬天制作的一种小型坐床，由几个人用绳子拉着在冰雪上行走。明代吕毖的《明官史》中载：“冬至河冻，可拖床。以木作平板，上加交床人或稿荐，一人在前引绳，可拉三二人，行冰如飞。遇积雪雪线，景更如

宁海县境内。

宋代时，乐清湾牡蛎开始盛行抛石养殖，这种养殖方式是牡蛎养殖最原始的方式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。南宋当地状元王十朋的诗句“珠屿小蛎圆带石，箸巨房深若杯”，写的就是这种养殖情景。在牡蛎的养殖过程中，乐清湾渔民还发明了插竹养蛎，即取生长较为均匀的竹竿（一般直径为1~2厘米，长约110厘米），插在流速较小、风平浪静的内海湾中潮带滩涂，由牡蛎苗自然附着插养。这一养殖方式在明代著作家冯时可的《雨航杂录》中也有记录：“渔者于海浅处植竹廬，竹入水累累而生，研取之名曰‘竹蛎’。”由于插竹养蛎成本较大，这种养殖方式逐渐被淘汰。

近年来渔民们通过抗风浪试验，发明了科技含量较高的延绳式垂下养蛎方法，它是由不同规格的多股聚乙烯绳、泡沫浮筒和铁锚连接成一个养殖单元，再由多个单元相互组合成养殖片进行的立体养殖。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，台风来时可减少泡沫浮筒，将养殖单元沉入水中，能减轻风浪的冲击，避免较大损失。

牡蛎的吃法有很多种，除生食外，还有芹菜烧牡蛎、牡蛎勾丸做汤、牡蛎炒蛋、牡蛎杂三鲜面等。它们都是佳肴美食，具有滋阴、降火、美容的功效，但不宜贪食。从古代的史料记载来看，清江的牡蛎也甚为美味。除谢灵运、王十朋、冯时可等文化名人尝过清江牡蛎外，清代著名思想家、学者梁启钊也在尝过清江牡蛎后赋诗赞曰：“蛎房海之美，当冠加恩薄。吴航与新溪，甲乙未易谱。”如今现代科技发展，牡蛎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，但公认吃牡蛎的最佳时间段是冬至到翌年清明，故乐清民间有“冬至到清明，蛎肉肥晶晶”的俗谚。

古韵今吟

阳锡洲



《冰嬉图》局部

古韵今吟

阳锡洲

诗词情怀万代长

文化传承中，先辈们将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乡愁与家国之思写入诗行，留下无数动人诗章。

古代游子远行，音信阻隔，有“感慨心如捣”的日夜焦灼；遥思亲人，“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”，更有“惨惨柴门风雪夜，此时有子不如无”的锥心自贡，企盼与牵挂都在思念翻转中说尽；捎信还乡，又生百般踌躇，“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”，纵使风尘仆仆归来，“低回愧人子，不敢叹风尘”。待到阅尽天涯，方悟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中蕴含的生命重量。

待到为人父母，始知“临行密密缝”的针脚里，藏着“爱子心无尽”的慈颜；在“见面怜清瘦，呼儿问苦辛”的端详中，才懂得“当时父母念，今日尔应知”的代际轮回。在勉励子女“力学如力耕，勤惰尔自知”的同时，若能“父子灯前共读书”，便能感受到更多人世间的温暖与慰藉。

手足之情，大抵是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天涯怅望，是“共看明月应垂泪”的异地同心；是“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”的离乱之痛，更是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旷达祈

愿。最动人莫过于苏轼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再结来生未了因”的血脉之约，竟可超越生死盟誓。

爱情在诗词中一向都能绽放斑斓色彩。从“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”的直白倾诉，到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人骨相思知不知”的巧思隐喻，爱情滋味万般重。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是灵魂的默契；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是重逢的期许。金昌绪《春怨》里“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”，是思妇对征人婉转的嗔怪；杜甫“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”，则写尽乱离中夫妻的渴望。至于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与“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”，便是对长久相伴最朴素的期许与践行。

至于友情，是白居易“君埋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满头”的生死契阔，是黄庭坚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岁月悬隔，是李白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的率真别意，是高适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慰藉，亦是王昌龄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交心自白。而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的折梅遥赠，“柳条折尽花飞尽，借问行人归不归”的

文调听泉

钱俊男

倚门怅望，皆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温情范式。

乡愁最是深藏难说破。崔颢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是苍茫一问，王维“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”是含蓄一探，杜甫“月是故乡明”是执拗一念，叶绍翁“萧萧梧叶送寒声，江上秋风动客情”是触景一叹，唐寅“多少天涯未归客，尽借篱落看秋风”是远望一帐。及至归乡，竟成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欲语还休。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余韵悠长。

家国情怀是诗词中最铿锵的声部。王昌龄“不破楼兰终不还”写尽边关将士的决绝，陆游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道出文人志士的孤忠，岳飞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更是民族危亡之际的壮怀激烈。文天祥兵败被俘，过零丁洋时沉郁顿挫，写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其声穿云裂石，其志光耀千古。

诗词情怀万代长，这是个体生命的深情吟咏，也是民族精神的不朽载体，更是炎黄子孙绵延千载的情感共同体。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”，至今读来，我们仍能汲取慰藉与前行的力量。

秦统一六国后，推行“书同文”政策，统一了文字，但语言的统一却非一朝一夕之功。汉代的共同语称为“通语”，扬雄所著《方言》中，便使用过“通语”这一名称，与各方言相对。汉代通语承袭先秦雅言，其标准音仍以洛阳一带的发音为基础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虽然政治分裂，但各地政权仍以洛阳雅音为尊。永嘉之乱后，晋室南迁，中原雅音与南方当地方言融合，形成“金陵雅音”。在北方，北魏孝文帝积极推进汉化，明令“断北语，一从正音”，要求官员使用汉语共同语。隋朝统一中国后，音韵学家陆法言编纂《切韵》，审定标准汉语发音，融合了南朝金陵雅音和北朝洛下雅音，建立了隋唐时期的语音规范。唐代在《切韵》基础上编修《唐韵》，科举考试也遵循礼部规定的音韵标准，这促使各地士人学习共同语。

“官话”这一称谓到明代才正式出现。顾名思义，官话最初是指官吏在官场上通行的话。明代初期，明太祖朱元璋颁布《洪武正韵》，以中原雅音为正音，

并将南京官话定为全国通用语。后来朱棣迁都北京，带去了大量南京人，南京官话在北京落地生根，影响了当地语汇。清朝早期，南京官话仍为官方主流标准语。但随着满族入主北京，满语与北京当地的汉语方言融合，逐渐形成了新的北京官话。雍正年间，清政府设立总督馆，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。雍正帝要求官员掌握“人人共晓之语言”，并规定“举人生员监生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应试”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行政命令方式在全国推广官话。

尽管古代有共同语，但其使用范围主要局限于官吏、士大夫和行商之间。普通百姓大多安土重迁，流动性小，缺乏使用共同语的客观需求。同时，在清朝雍正年之前，朝廷并未大力向全民推广共同语，因此各地方言差异依然显著，甚至朝廷上也常因语言不通而需要翻译。《朝鲜实录》记载，明清时期，朝鲜使臣来华，需要学习中国的官话；而清初的皇帝听不太懂福建、广东官员的方言，允许在召见时配备“翻译”。对士人而言，

掌握共同语却是进入仕途的关键。从学校教育到科举考试，再到入仕为官，科举贯穿始终。学校采用共同语授课，科举考试要求考生使用官方规范的读书音，而官员在发布政令、汇报工作时也必须使用共同语。

现代意义上的“普通话”概念，最早由清末“切音字运动”的积极分子朱文熊提出的。他在1906年出版的《江苏新字母》中注明，普通话是“各省通用之话”。1911年，清政府学部通过《统一国语办法案》，正式将“国语”定为官方语言，并以北京音为标准。1955年，新中国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，将“国语”改为“普通话”，并确定了其科学定义：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，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，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。”不过有趣的是，今天普通话的标准音采集地并非北京，而是河北省承德市的滦平县。承德方言在谱系上属于北京官话，字正腔圆，音准分明，与普通话极为接近。

国学小知识

“五湖四海”指什么？

“五湖四海”作为一个成语使用，起码有一千多年了。《全唐诗》卷八五七吕岩《绝句》云：“斗笠为帆扇作舟，五湖四海任遨游。”宋人李洪《謁皇甫清虚》诗云：“五湖四海仰仪形，道貌天真孰可名。”

而在更早之时，“五湖”与“四海”是分开使用的。“五湖”所指，典籍中的说法不一。《周礼·夏官·职方氏》述及扬州，有“其川三江，其浸五湖”之语，不少注释都说“五湖”不是五个湖，而是指太湖。当然，实指为五个湖的更多见。《水经注》卷二十九《沔水》，以太湖及附近四湖为五湖，即长荡湖、太湖、射湖、贵湖、滆湖。《后汉书·冯衍传》“沉孙武于五湖兮”句下，李贤注引虞翻之说，认为五湖是指滆湖、洮湖、太湖、射湖、贵湖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“五湖”不只一湖，也不在一地，是指太湖、鄱阳湖、青草湖、洞庭湖、洮清湖。

“四海”的说法起源也很早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说：“文命敷于四海。”《礼记·祭义》中说：“夫孝，置之而塞乎天地，溥之而横乎四海，施诸后世而无朝夕，推而放诸东海而准，推而放诸西海而准，推而放诸南海而准，推而放诸北海而准。”古人认为中国处于天下正中间，四周都有海，所以周边称四海，分别是东海、西海、南海、北海，外国就是海外了。

五湖、四海的范围都很广，合在一起就可泛指全国了，有时甚至泛指全世界。

说文解字

侯杰

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，很多人习惯将其中的“为”字读作四声，理解成“为了”，认为“人如果不为自己谋私利，就会被天地诛灭”。其实，这是一场流传甚广的误读，它的真面目读作二声，是“修”为“修养”的意思。

在儒家语境中，“为己”是君子立身的核心。《论语》有言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朱熹注：“为己，欲得之于己也；为人，欲见知于人也。”意思是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身修养，完善品德；而现在有的人学习却是为了做给别人看，博取虚名。这种“为己之学”，正是“人不为己”中“为己”的源头。一个人若不注重自身修养，放任内心的私欲膨胀，言行背离道德准则，便是背离了“天道”，最终被众人唾弃。

道家思想中，“为己”则指向顺应自然的自我修行。《道德经》强调“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”，主张人要向内求索，修养自身的德行，才能契合自然规律。若不修己身，任由欲望裹挟本心，就会打破内心的平衡，也会破坏人与自然、人与他人的和谐，这便是对“天道”的违背。

生活中，很多人曲解了“为”字的含义，将“修己”的劝诫扭曲成“利己”的宣言。于是，这句话本是劝人向善的古训，反倒成了某些人追逐私利的“遮羞布”。

其实，放眼历史，那些被后世铭记的贤者，无一不是“为己”的践行者。孔子周游列国，颠沛流离，却始终坚守“克己复礼”的信念，这是修己；王阳明龙场悟道，在绝境中砥砺心性，提出“致良知”的主张，这也是修己。他们的“为己”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，而是通过完善自身，进而影响他人、造福社会。正如《大学》所言：“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修己，从来都不是独善其身的自私，而是兼济天下的起点。

在当下社会，真正的“为己”，是修养品德、坚守良知，是守住内心的方寸之地。当每个人都能以修身为己任，约束私欲、涵养德行，人与人之间便会少一分算计，多一分真诚；社会也会少一分浮躁，多一分温润。

人不为己 是为了自己吗